



南宋 宋孝宗赵昀手诏卷 四川博物院藏

走进“古今私家收藏第一人”项元汴的朋友圈——  
500年后又逢君

■ 本报记者 顾雨婷 沈烨婷  
通讯员 杨波

“橐李文人数字京，阁收遗迹欲充楹。云烟散似飘天籀，明史怜他独挂名”。这是乾隆所作的《天籀阁》。说起书画收藏圈，乾隆排得上名号，而连他都“盖章”点赞的民间收藏家，正是这首诗的主角——项元汴。

项元汴，字子京，号墨林，嘉兴人，明代鉴赏家、收藏家，被誉为“古今私家收藏第一人”。其天籀阁藏品上起东晋“二王”，下至“明四家”，在“收”与“守”之间撑起半部中国书画史，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。据考证，天籀阁书画收藏共有1400余件，涵盖460多位历代书画家作品，数量之大、质量之精，世所罕见。《嘉禾徵献录》载：“海内风雅之士，取道嘉禾必访元汴，而登其所谓天籀阁者。”一人，一阁，留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脚步，也让嘉兴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文化交流的中心。

今年是项元汴诞辰500周年，“天籀回响——项元汴诞辰500周年书画特展”目前正在嘉兴博物馆展出，展期至8月10日。来自全国17家文博单位的50件珍贵文物，无声诉说着中国收藏史上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
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大博物馆中的项氏旧藏纷纷“回嘉”，不仅再现了中国古代盛世收藏的“天籀”绝响，也让人们得以“穿越时空”，去遇见项元汴和他的“朋友圈”。

其人

项元汴为什么能够成为名重天下的大收藏家？这要从项氏家族说起。

项氏家族原籍河南洛阳，后因朝都更迭，举族迁至嘉禾地区。从宋代到清初，项家出了13个举人、11个进士，曾伯祖项忠官至兵部尚书，兄长项笃寿一家更是“三世进士”。

其父项铨，“治生臆算，盈缩无爽”，善经商，逐渐积累家资。传至项元汴这一代，项家已成为富甲海内的大户。家中财帛丰沛，项元汴就将家中资产投入了收藏事业，广罗历代书法、绘画、图书、金石、彝器、墨砚等。

为还原项元汴的成长轨迹，“天籀回响——项元汴诞辰500周年书画特展”呈现了项氏家族图谱。“项元汴的收藏是中国书画研究的基石之一，看了展览才知道，原来项氏家族都在为艺术做贡献。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景中说。

除了家族“遗传”基因打底，还有时代盛行此风的原因。当时，江南一带有“堂前无古画，不是旧人家”一说，收藏书画就等于如今人们喜欢投资理财、买爱好手办一般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

一个非常爱“买买买”的富二代，生在一个热衷艺术收藏的地域和时代，就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
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，14岁的项元汴，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收藏——宋徽宗的《岁华图》。今天我们会看到，图后写着：“嘉靖戊戌春仲，墨林项元汴鉴藏。”有人将这视为这位大藏家收藏之路的开始。

有趣的是，项元汴所著的《蕉窗九录》，是最早记载“唐伯虎点秋香”故事的文学笔记。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唐伯虎看到一艘画舫上有漂亮女子，打听之后得知，是某仕宦家的婢女，于是隐瞒身份进入府中，最后求得了姻缘。

其阁

一座天籀阁，半部中国书画史。  
“海内珍异，十九多归之。”——



展览现场，观众拍摄展品。

项元汴本人既有鉴赏的眼光，又有经济头脑。他曾对徽州鉴藏界的代表人物之一詹景凤说，“今天下具眼，唯足下与汴耳”。从辽宁省博物馆首次外展的项元汴《竹石图》可以看出，项元汴自身的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。画中笔致清秀，意境深远，可谓嘉兴一派之首。而他每购得一物，总习惯将收购之价或预估估价记在画幅和书卷末尾。据传，一旦项元汴得知所购古籍书画价格高于其价值后，常常悔恨不已，寝食难安。

《明马图项元汴画像》就勾勒出了他睿智、成熟的儒商形象——下巴略尖，眼窝深陷，眉毛稀疏，双目刻画尤为传神，甚至连左眼双眼皮、右眼单眼皮的细微特征都表现了出来。这幅画像现藏上海博物馆，作者马图以人物肖像见长，且该作品绘就时间最早，被公认为是项元汴最为可靠的形象依据。该画像真迹于2018年首度向世人亮相，此次也是首次在上海博物馆之外展出。加上《民国马图款项元汴画像》《民国庄益三、郭兰泽项元汴画像》，三幅书画勾勒出了不同时期的项元汴像。

而在策展人，嘉兴博物馆马家浜管理部主任、副研究馆员刘云峰眼中，《明马图项元汴画像》的跋语更显珍贵。跋语作者叫王雯，字伯雨，江苏吴江人氏，与项元汴属诗词密友。一次，王雯在拜访项氏后，即将从嘉兴返程，临行前应项元汴之请，留下了四首绝句，可谓藏满了“彩蛋”。

第一首中，王雯写了对肖像作品的观感，“龙马精神海鹤姿”，暗示了画中人已步入老年；第二首，他又写项元汴的宏富收藏，“千秋君已画中人”，一语双关，既褒扬其收藏成就，又称赞画像的艺术水平；第三首直写天籀阁，“峨峨杰阁层云上”，可见久负盛名的天籀阁体量庞大，楼层颇高；最后一首“今与传神齐绕膝”，系夸赞像主儿孙满堂。

据董其昌《墨林公墓志铭》记载，出身名门的项元汴素极为俭朴，衣着如乡下老农一般，日常开销，“皆有常度”。但遇救济灾民穷人，他却毫不吝惜，用项元汴自己的话说是“吾自为节缩，正有所之用也”。在项元汴生命的最后两年，浙西大灾，他开仓赈灾，救活了上万人，事后不求任何表彰。他对功名也持恬淡的态度。明代万历初年，皇帝召他出来做官，也被他拒绝了。

代词宗”朱彝尊曾这样形容项元汴和他的天籀阁。在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”收录的1700余件珍贵的元代及以前卷轴、册页数字图像中，仅项氏天籀阁旧藏就达200余件，所占比例之高，在历代藏家中绝无仅有。如今，关于其藏品的统计仍在“动态化”更新。

他的收藏里都有些啥呢？随便说几件就能震惊世人：顾恺之《女史箴图卷》、李白《上阳台帖》、怀素《自叙帖》、赵孟頫《江山萧寺》、米芾《叔晦帖》《李太白帖》《张季明帖》、王羲之《此事帖》、黄庭坚《伏波神祠》、钟繇《荐季直表》……

收的是珍品，藏的是故事。在《南华录：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》一书中，当代作家、学者赵柏田曾这样描绘项元汴的收藏：“他购买的乃是逝去的时间，买的是往昔。”

譬如阁名，便与一张琴有关。在此次特展的展厅中央，一张刻有“天籀”二字的古琴静静陈列，琴底项间可见“明项元汴珍藏”篆书铭文。“这张琴是复制品，真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”刘云峰说。嘉兴地方志记载：“天籀阁，项元汴藏书之所，在城内灵光坊。尝得铁琴一，上有‘天籀’字，下有孙登姓氏，因以名其阁。”由此可证，天籀阁得名于项元汴收藏的一张刻有“天籀”二字的古琴。

来自四川博物院的真迹《宋孝宗赵昀手诏卷》，亦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。它不仅曾是天籀阁的旧藏，更与嘉兴渊源颇深，出自历史上唯一在嘉兴出生的皇帝——宋孝宗赵昀之手。

这份手诏，是宋孝宗赵昀针对名臣虞允文请辞官职颁布的不允辞退敕。“牛马想聊平，领导不同意。”四川博物

院典藏部副主任刘舜尧如此解读这件展品背后的故事。

赵昀是南宋的第二位皇帝，《宋史》评价他“卓然为南渡诸帝之首尊”。为雪靖康之耻，赵昀对虞允文委以重任，希望其能助力北伐。手诏中，赵昀情辞恳切，希望他不要辞去枢密使的职务，并叮嘱“春暖，卿比平安好”。而后来虞允文日夜奔忙，积劳成疾病死四川，痛失爱将，赵昀也未竟北伐之志。

“这件展品真迹只展出了15天，目前大家看到的是复制品。”刘云峰说，这件展品的真迹是不久前才修复完成的。所谓“纸寿千年”，由于年代久远、对展出条件要求高，《宋孝宗赵昀手诏卷》真迹在嘉兴展出完毕后，已回到四川进入长久的“休眠”。

在嘉兴的收藏史上，何以会出现项元汴和天籀阁？

刘云峰认为，明代嘉兴作为大运河上重要的枢纽，经济发达、文化昌盛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收藏家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。

透过神一件件珍品，人们似乎窥见了一个藏在天籀阁背后的晚明“艺术社交圈”。在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封治国看来，明中晚期，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艺术圈，逐渐向嘉兴转移，项元汴的天籀阁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在阁中，项元汴经常与书画家、收藏家及友人一起研究把玩他所收藏的书画珍品、名贵古籍，访客宾朋纷至沓来。

其志

天籀阁从一处单纯的物理建筑，上升为一个文化交流空间，敞开大门，用丰厚的收藏、开放的姿态欢迎文人墨客。

要说明代吴门地区的书画核心，非文氏家族莫属。文氏与项氏交好，项元汴的收藏审美长

■ 本报记者 顾雨婷

书画若龙，印章点睛。古往今来，乾隆是公认的“盖章狂魔”，但在项元汴面前，他只能排第二。有统计显示，唐代褚遂良摹的《兰亭序》上有鉴藏印215方，又半印4方，而其中项元汴印章占98枚，乾隆的才10余方。

纵观天籀阁的藏品，印章成为显著的特征。在藏品的卷首、卷尾、骑缝等处，都钤满了项元汴各式各样的图章，“项子京精玩印”“子京珍秘”“项墨林父秘笈印”“子京所藏”“项元汴氏审定真迹”等等，少则近十，多则逾百。

来自上海博物馆的一件真迹《明项元淇致项元汴短简》可佐证其嗜好。这



明文徵明水墨枯木幽兰图轴 海盐县博物馆藏

成，也离不开“艺术导师”文徵明。此次特展展出了7件文徵明、文彭父子的展品，如《明文徵明行书七言诗轴》《明文徵明水墨枯木幽兰图轴》《明文彭草书傲园杂兴诗册》，吸睛无数。

文徵明是与沈周、唐伯虎、仇英并称“吴门四家”的书画大家，以温润秀雅的画风闻名天下。文徵明比项元汴年长近40岁，虽然“差了辈分”，却成了“忘年交”。

垂垂暮年的文徵明，仍然悉心教导这个对书画无限热情的小辈。在项元汴身上，文徵明或许看到曾经那个风华洋溢的自己。项元汴对他的崇拜，亦刻进了天籀阁的收藏里，他一共收藏了二十多幅文徵明的作品，其中一部分作品也成为了项元汴文人身份的象征。

“吴门四家”之一的仇英，也与项元汴关系密切。据载，比项元汴年长27岁的仇英，曾长期在项元汴家蹭住。清代吴升的《大观录》著录了仇英的《沧溪图》，卷称项元汴“馆仇氏十余年”。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、深厚。

项元汴还提供了大量南宋画院以及元代的绘画真迹供仇英临摹，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他的临摹水平以及绘画风格的形成。仇英还用画作充抵“生活费”，项元汴以两百金的高价买下了仇英的《汉宫春晓图》。

比项元汴足足晚生了30年的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，与项元汴结识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画坛新秀。微末之时，董其昌得以入天籀阁观画，如入宝山，眼界为之豁然洞开，此番经历对

延伸阅读

古人为何“盖章”上瘾

是项元汴的大哥项元淇随手写给他的一张便条。内容主要是有一位卖玉冠的老者，想跟他以物换物，哥哥问弟弟，这个买卖值不值。就是这么一张生活中的“小纸条”，项元汴也“啪啪啪”往上头盖了三个印章，收藏了起来。

项元汴的印章也多如牛毛。嘉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知名收藏家俞星伟曾做过调研，关于项子京的自用印，据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即收入一百零八方。“这些印都是从流传下来可见到的项氏所藏书画古籍上钤盖而录取，想必实际拥有的数量远不止此。”俞星伟说。

在喜爱的书画收藏上盖章，并不是项元汴一人的爱好。文人大家为什么钟情盖章呢？

其日后艺术理论的形成影响至深。据董其昌《墨禅轩说》载：“三五年间游学就李，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，始知从前苦心，徒费年月。”

“明末工艺四大名家”之一的铜器工艺名手张鸣岐，未成名时，只是嘉兴新塍的一名小工匠。项元汴发掘了他，将他带到了城中，自此小工匠名声大噪。张鸣岐便也学项元汴的“盖章”嗜好，在自己的手炉作品底部，盖起“张鸣岐造”或“鸣岐”字样的章来，时称“张炉”。

此外，陈淳、陈继儒、李日华、周履清等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名家、学者、诗人和鉴赏家，都与项元汴交往甚密。项元汴与画工、僧人、民间手工艺者以及年轻的后辈皆能平等地交往，以自己丰富的收藏促成了江南地区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。

种善因，结善果。“项元汴秉承着一种‘开放式鉴藏’的理念，使得藏品本身也成为了美育的鲜活教材，艺术价值极高。”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冯巍认为，展览所呈现的项元汴与文人画家、各界人士共赏珍品的历史场景，对当今的美育工作提供了深刻启示。而项元汴这种让艺术珍品与社会共享、让书画之美浸润大众生活的理念和实践，正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“文化密码”。

文化，因交流而繁荣，因传承而兴盛。从天南海北归“嘉”的天籀阁旧藏，何以保护传承？嘉兴市美术馆、嘉兴市美协、嘉兴市书协携手，组织会员执笔为桨，临摹天籀阁旧藏，并以项元汴与天籀阁相关的学术成果为蓝本，再度进行视觉艺术创作，最终精选出45件展品，归入本次展览的第四单元——天籀阁藏品转化。

嘉兴博物馆副馆长陈宽还透露，目前博物馆已完成相关展品的数字化扫描工作。“利用高精度扫描和成像不仅用于记录和研究，也为未来可能虚拟修复、展示和复制提供基础，减少原件不必要的提取和展示。”陈宽表示。中华文明的火种，需要无数双手接力守护，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火相传。

500年前天籀阁的月光，终将照亮今人的眼睛。

印章最初是信物，起印证作用。宋、元以后，因注重书画题跋和署款，书画家们逐渐认识到印章的艺术作用，使书画印合璧的艺术得以形成。这也成为中国书画区别于西方的特征之一。除了作者题款署名，再钤上一方篆刻的印章，就像清代著名画家吴昌硕所说的，“书画至风雅，亦必以印为重。书画之精妙者，得佳印益生色”。

书画上常见的印章有姓名章、闲章、鉴藏章等多种类型。一方面，在作品上署名盖章，以示郑重，有“防伪”作用；另一方面，盖上富有雅趣、寓意的闲章，还可寄托作者的抱负和情趣。唐宋时期，民间收藏之风兴盛，鉴藏印章便始于唐朝，于宋朝以后盛行。一方方鉴藏印章，代表着收藏家的曾经拥有，如同时间胶囊，记录下每一件作品在历史中的转折与归属，成为书画作品传承脉络的印证与载体。

印章还承载着收藏者个人的品位与审美。印章材质也多考究，金、银、铜、玉或水晶、犀角、象牙、竹、木等，这一切都折射出古代收藏家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。而经过名家、皇室收藏钤印的作品，多了“官方认证”的属性，在艺术品市场上，更多了一重稀缺的吸引力。

钤印也是门技术活——用印得当，则书、印相映成趣，有锦上添花之妙；反之则弄巧成拙，画蛇添足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盖章也是古人“点赞”的一种方式。小小的一枚枚印章，穿越古今，不仅是鉴别真伪的凭证，作品传承的见证，艺术提升的印证，也最终成为了收藏作品价值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印章与书画共同为作品赋予更鲜活的生命力，使得其在千百年之后，依然能熠熠生辉。



明 马图项元汴画像 上海博物馆藏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嘉兴博物馆提供